

## 第二章 說鬼

「談鬼說怪」的發想源頭開始於何時？文獻記載最早是在《山海經》，山海經書寫方式以「博物志」的概念呈現，按漢劉秀（歆）《上山海經表》稱

皆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絲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鱗鳳之惡，著《山海經》。

《山海經》以詳述山川海陸為軸，以神異幻想構成，而後中國古代鬼怪作品還深受釋、道等宗教的影響，宗教相信，在現實社會世界之外還存在著超越自然、人間的神祕境界和力量，這種力量主宰著社會和自然，因而有人們對它敬畏和崇拜。

宗教是原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最初是作為原始人群的自發信仰產生的，在原始社會中，人對於自然界的事物一切都是懵懂未知，無能為力，分不清諸多事物是為人力還是自然力，因而將自然力人格化，變成超自然的神靈，後來隨著最初的自然崇拜發展出對神靈、祖先、圖騰的敬拜。宗教將人的肉體與靈魂區分開來，認為這可以彼此獨立。自漢魏晉南北朝以下，漢民族的信仰是多元化。全國性的兩大宗教是：從南亞傳播而來並逐漸漢化的佛教，以及本土產生的道教。它們的教義反映在小說中，並某種程度上是融合在一起。中國鬼怪與宗教的關係，總的來說極為密切，在傳教的過程中，佛教又大量的採集，使用許多來自南亞的神話、民間故事和長篇史詩、說部、寓言等，並改寫非佛教的神，使之為佛教服務。道教是漢族自身創造的宗教，大致始於漢末，從張道陵立教開始形成，在長期的與佛教爭勝的過程中，傳教方式、手法加以改造使之成為自己的東西，為己所有。在每個時代各種融合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民間信仰，為了強化宣教的目的，爭取更多信徒，釋、道兩教皆利用了創作小說故事作為手段。因此，釋、道兩教直接影響了我們創作故事的思維以及對小說的使用。

晉代葛洪的《抱朴子》言：「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sup>1</sup>人欲想著求生的慾望，但死亡卻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基於「變幻」的觀念下，事物皆有變

<sup>1</sup>晉葛洪《新譯抱朴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

化的可能，然而生死的變幻則是為何物呢？或許肉體只是暫時的處所，靈魂會再度重返人世，不論哪種形式，哪怕是「游走」還是「蛻變」，無不傳達了中國的想像世界裡，有著「游」即「變幻」的深層意義。亦如晉代干寶《搜神記》裡為「妖怪」一詞下了一個定義：「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裡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sup>2</sup>認為無物不變化，無物不可成精，人亦如此。干寶對於妖怪的定義清楚地呈現中國想像世界，即指「鬼魅魍魎」的世界，是相互依存，不可拆離的。它並非憑空而生，它與人間並存，看似混沌無法捉摸，但非如此，一切的變異，可以說是「幻」，內在的精氣所變，游魂所變的。有趣的是，基於「游」即「變幻」的深層意義，我們編織出一套看似綿密並與我們生活緊緊依存的系統，一套講述靈魂必經的途程。在這些講述鬼魅魍魎的通俗表演裡，這些故事無不以這套系統為出發，意有所指地反映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社會。

### 故事：《碾玉觀音》、《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

《碾玉觀音》<sup>3</sup>這篇話本小說發生的時空是在汴京失覆，南渡臨安之初<sup>4</sup>。璩秀秀是個窮苦市民女子，因家貧乏力，被迫「獻」入王府當「養娘」即婢女，郡王給了身價錢，等於是賣給了王府了，實際的成爲了女奴，因爲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活，爲王府繡花當婢女。但是，她不甘心當被人使喚的奴婢，在這個平凡的市井女子心中，有著追求自由幸福的渴望。她愛上了王府裡的玉匠崔寧，就積極行動，趁王府失火混亂之際，主動要崔寧與她一起逃走；逃到崔家後，便明白提出要與崔寧結爲夫妻。崔寧平日對璩秀秀癡心，但是懼怕郡王的強權，不敢追求璩秀秀。她竟以「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來威脅他，逼崔寧與她結爲夫妻，一起遠逃，擺脫郡王的控制。璩秀秀不怕社會的眼光，勇於表達她真率的愛情，而且以如此強烈的情感要崔寧一同戰勝怯懦，試圖跨越階級上的障礙，雙雙遠走他鄉，「好做長久夫妻」。

他們遠逃兩千餘里，仍舊無法逃脫封建統治階級的霸權，郡王的魔爪，璩秀秀被郡王派人抓回，活活打死。但封建霸權者只能傷害璩秀秀的身體，卻阻止不了她追求愛情與自由的熱情，扼殺不了她的真情，她與崔寧做不了「生眷屬」，變了鬼也要與摯愛的人一同生活，她如此頑強，即便化爲鬼也不願屈服強權，執意地追求自由的愛情與婚姻。可怕郡王卻仍不放過秀秀的魂魄，命人要抓回她。在陽間的封建社會，根本沒有女人的立足之地，特別是地位卑賤的奴婢、下女，

<sup>2</sup> 晉干寶《新譯搜神記》，（台北：三民書局，1985）

<sup>3</sup> 《碾玉觀音》，《警世通言》第八卷題作《崔待詔生死冤家》，原注：「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寶文堂書目》子雜類有《玉觀音》，即爲此篇。

<sup>4</sup> 《碾玉觀音》故事的時空大約在南宋紹興（1131-1162）年間之初，即是紹興和議後不久，發生地點於臨安城內。

他們簡直是霸權下的附屬品，一紙賣身契約決定了她們的一生。於是璩秀秀便把崔寧也一起拉下那郡王的勢力無法達到的陰間去，作一對鬼夫妻。

另一則故事發生在北宋亡於金人後的第三年（西元 1129 年）。那年元宵燈節的晚上，落籍於燕山（即北京）的楊思溫偶遇一似曾相識的女子。就像是許多宋亡後未能及時難渡的北人一樣，楊思溫陳臣服異族統治，苟且偷生。楊思溫在燈會上所遇見的女子竟然是他結拜兄弟韓思壽的妻子鄭意娘。從意娘口中得知她和她的丈夫韓思壽在東京（即汴京）失陷時被亂軍驅散，而她如今被在燕京的韓國夫人收留權充女婢。在這同時，已經南遷的韓思壽隨著南方朝廷（南宋高宗）的議和者重回故土。楊思溫向兄弟韓思壽提及與意娘相遇，才大吃一驚，意娘早已死了。

故事急轉直下。原來鄭意娘落入金人手中後便自殺以明志，然而她卻不能忘卻人世情緣。意娘與韓思壽重逢一景，成為故事的高潮。即使化為冤鬼，意娘也要還魂與一訴前緣。楊思溫問起意娘一起出沒的其他女子，究竟是人是鬼，意娘嘆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sup>5</sup>

鄭意娘的故事可視為中國古典鬼魅傳奇故事中的典型之一：生當亂世，社會與天地的秩序蕩然無存，種種逾越情理的力量翻動了一切。死生交錯，人鬼同途。這個故事對於北宋覆亡後的情況，有相當生動的描述。意娘重返人世，令尚活於陽世的楊思溫、韓思壽猛然驚覺，逝者已矣。從《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感嘆汴京風華的消逝，到《碾玉觀音》秀秀忿恨沿襲汴京而來舊封建制度所帶來的壓迫，呈現出南宋人對於昔日的汴京兩者迥然不同的情感。

### 故事：《胭脂扣》、《熱血少年》

《胭脂扣》這則故事發生的時空是在西元 1988 年的香港西環區，從上環到西環區是香港英殖民早期劃定的華人居留區。算是香港古老歷史中的中國城，沿路可以看到許多階梯街道、整街的乾魚南北貨和草藥店、陰鬱的古董藝品和二手舊貨街，這兒的景觀充滿了濃郁的底層氣息。袁永定是一位報社廣告組主任，那晚他留在報社等著女友一塊下班，而女友爲了要搶獨家新聞，要他一個人獨自回家。於是他便收拾東西下班，就在此時來了一位穿著旗袍的女子，找他登一段這樣的尋人廣告：「十二少：老地方等你，如花」。可是那女子身上並沒有錢，袁永定便回拒了她的請求。回家途中，那女子一路跟隨著他，他見其異狀便探問她的身分及意圖。袁永定驚覺，原來那女子不是人，她是五十年前早已離世的亡

<sup>5</sup> 此一故事出自洪邁，《夷堅志·太原意娘》，南宋時期已演變成爲了流行的話本故事〈灰骨匣〉，元代沈賀曾有雜劇《鄭玉娥燕山逢故人》。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台北：丹青，1983），頁 222-23，243-44。

魂。如花爲了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與十二少一塊殉情，她在地府等待與十二少重聚，卻等了五十年。於是她不惜犧牲投胎的機會，返回人間尋找十二少。她的執著感動了袁永定和他的女友，決定一起協助她。袁永定遍尋舊報紙、舊貨店，找到如花自殺的新聞，他才得知，如花因爲害怕十二少畏死退縮，在十二少吞鴉片前，先在酒裡混入安眠藥。然而命運捉弄人，十二少卻幸運獲救。三人經歷了一番辛苦地詢問，如花終於找到了十二少，她看到十二落魄苟活的模樣，十二少枉顧了兩人的愛情誓言，一切都令如花痛心欲絕，於是她將兩人的定情物胭脂盒還給十二少，便悵然離開人世，不再回首前塵。

《熱血少年》和《胭脂扣》相似，一樣也是爲了愛不惜犧牲生命的故事，但它卻帶來恐怖的復仇氣息。故事的發生已經是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有三個各自擁有稀有血型的青年，阿樂是一位年輕的警員，他與做裁縫的父親住在一個老舊的住宅，這個住宅即將改建，住民相繼搬離，龐大密雜的住宅如今已人去樓空，只留下阿樂他們家和對面讓人覺得神祕的道觀。

自從脫離英國殖民回歸中國後，香港的城市容貌也漸漸尋求改變，想要呈現出新的氣象，到處都在工程施工、大樓重建。阿力是剛從國外留學回港工作的建築師，他正在這兒從事公共工程的督工工作。阿敏因爲小時候目睹母親砍殺父親的緣故，遭受到嚴重刺激，自此精神狀態一直都不太穩定，經常進出病院治療。三人因爲捐血救助的關係意外成爲命運共同體，他們三人相互感應到彼此的存在，因爲他們三人捐血拯救一對自殺跳樓的情侶，而捐血的結果反而拆散這對情侶，令他們陰陽相隔。獨自走上黃泉路的女子燕萍心有忿恨，恨三人多管閒事，於是憑著三人捐助她的血液召喚、控制他們，向他們三人索命報復，要他們三人之中去結束她男友的生命，來完成他們共赴黃泉的願望。故事便發生一連串離奇的死亡事件，三人相繼深陷死亡詛咒。三人亟欲設法擺脫燕萍的怨念，尋求宗教（道教、基督教）人士的援助，各種儀式，依然無法掙脫那女子的報復。故事的最後，是由阿敏來完成結束女子男友生命的任務，最終阿敏得以倖存，但恐怖的是她永遠無法清醒過來，終身禁錮在精神病院裡，永遠地深陷在詛咒中的命運。

這兩篇以香港爲時空的故事，同樣都是愛情的悲劇。兩個故事相比起來，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香港社會意識。《胭脂扣》、《熱血少年》各自呈現香港不同年代的愛情觀、生命價值。《胭脂扣》在敘事上透過重述傳統的愛情，展現出三〇年代與八〇年代不同的道德、價值觀樣貌，闡述經過了五十年不同的政治、經濟的衝擊後，香港社會變化的腳步變得更快，人對於情感的付出愈來愈小心翼翼。到了九〇年代，《熱血青年》把這份對於情感的付出呈現爲更具自我意識，每個人各自活在自我完成的意識中，不論是工作、愛情、生活都更爲孤離地置身於瞬息萬變的時空，意義與價值都將傳統的、既有的一一消解，而轉換爲新的價值，新的生存法則。在這裡，每個人都必須學會這套法則，否則將面臨社會反噬自我

的危機。

## 第一節 城市的移動——從汴京到臨安

### 一、 打造這座城

自西元 1127 年金人<sup>6</sup>入侵汴京，史稱「靖康之禍」，擄走徽、欽二帝，北宋政權的結束，並同年另立宋高宗，自此南宋政權開始。不過在西元 1127 年到 1138 年期間，南宋不斷與金征戰周旋，政局紛亂。直到汴京陷落十年後，宋高宗決定選擇將杭州作為都城，定都名為「臨安」，從此杭州成為南宋 125 年來的首都，也展開了杭州極盛時期。

臨安在兩宋之際曾因為方臘起義和金兵南下等戰爭遭受到嚴重破壞，人口減少很多。宣和二年（西元 1120 年）年底，方臘軍進佔杭州，據說「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sup>7</sup>。建炎四年，金兵甚至血洗臨安，七日下令洗城，自州門開始殺人，四面放火，十四日使撤離<sup>8</sup>，光是在清波門竹園山一帶就殺死萬人<sup>9</sup>。所以從建炎年間以後，所指的是定都臨安之後，臨安人口數才開始增加，城市才開始慢慢繁榮起來，這時的杭州人口，因為「高宗南渡，民人從者如歸市」，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使臨安人口激增，所以時人曹勛說：

臨安在東南，自昔號一都會。建炎及紹興間三經兵燹，城之內外所嚮墟落，不復井邑。經大駕巡幸，駐蹕吳、會，以臨浙江之潮，於是士民稍稍來歸，商旅

---

<sup>6</sup>金人所指女真民族，據舊史記載，是出於隋唐時代居於東北的靺鞨，女真民族的始祖是由高麗來的函普，即完顏部的創始人，早期女真族受遼國所制，直至西元 1114 年，金人完顏阿骨打起兵叛遼，次年正式稱帝，立國號金，往後十年內，攻下遼國諸城，取代了遼國在北亞的地位，而在金太宗、金熙宗時期的金帝國，自完成了與宋合力滅遼後，積極南侵中原，欲使北宋滅亡，故於西元 1127 年入侵北宋國都汴京，擄走徽宗、欽宗二帝，致使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禍。靖康之禍後，宋朝另立帝，為宋高宗，此後的宋室就是南宋皇朝。此後金人繼續南侵，宋金長期戰爭。南宋初年，不光是與金征戰，再加上中原失覆，社會秩序大亂，還必須征討各地盜匪，造成宋高宗不採與金繼續周旋征戰，決定與金議和，於是在宋高宗圖求苟安的心理下，西元 1138 年，南宋定都於臨安，不再有打算北歸恢復之念頭，自此宋金和談多次，於西元 1141 年，宋金和議，宋願向金稱臣納貢，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此和約訂立後，便結束了南宋與金人之間長期戰爭，開始有了偏安之局勢。

<sup>7</sup> 《泊宅篇》卷 5，頁 29。

<sup>8</sup> 《忠正德文集》卷 7，《建炎筆錄》。

<sup>9</sup> 《泊宅篇》卷 6，頁 35。

復業，觀闕崇峻，官舍相望，日聞將相之傳呼，法從之朝會，貢書相屬，梯航踵至，翼翼為帝所都矣。<sup>10</sup>

臨安人口劇增，移民主要來自於北方，靖康元年（西元 1126 年）以及紹興八年（西元 1138 年），移民如潮水般湧進杭州，這些移民者主要是來自汴京及西北各路的政府官員及其家眷，當時這些人落難與此，流離失所，迫於無奈也只好隨遇而安，他們的妻妾家眷只好住在軍營。但因為附近娼妓眾多，達官貴人的夫人小姐不宜久居，丈夫們便到城裡四處尋找居所，臨安城內興建不少大建築物，爲了好盡快容納這些大批的新移民，其他的難民則是先暫住在杭州的各寺廟或其附近，沿著杭州城垣慢慢發展。

因爲人口短時間內迅速增加，爲了盡快安頓新移民，杭州城內建築物林立，街面與巷道緊連在一塊。時人周密曾形容當時臨安城內的樣貌，說：「臨安城廓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sup>11</sup>照周密的說法，此時的臨安呈現人口擁擠的情況，嚴重房荒。據謝和耐《南宋社會生活史》談到臨安城的住宅區分布，當時杭州城外的郊區延伸並不太遠，山南爲宮城所在地，高級官員都住在山坡區；以外貿致富的商家則住在更爲南區的鳳凰山，那邊可說是杭州高級住宅區。而在宮城北面窪地，人口過度稠密，御街外的貧民區密度極高，此處高樓林立，坊巷既狹窄又擁擠，貧民區的房屋正面極小，縱深長。一樓多半是店舖，或是工匠的工廠。謝和耐引用了周密《夢梁錄》所記，發現了杭州城內的房屋每層樓的居民必須按月交租給屋主，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產業，而那些公有產業則設立樓店來管理租業，設官員來徵收住戶的租賃錢。

透過謝和耐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幾點現象：首先，臨安城因爲政治的因素，大量北方移民移入城內，使得臨安城的居民普遍都是新移民。從他們遷居與此的過程，這些移民心理上普遍只求圖安，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畢竟戰亂令他們歷經太多生離死別，能倖存實爲萬幸。這些移民普遍在遷至臨安後，也就顧不了太多，把找到臨時安頓的居所爲當務之急，因此，臨安的城市發展也因爲這些移民者的心態下，使得城市處處繁豐擁擠。

## 二、身體的適應

汴京人自靖康之禍發生後，陸陸續續隨著朝廷遷移到南方。在這段過渡期間，每個人都深刻體驗到天災人禍、家破人亡的苦難，承受很大的壓力。多數遷居於臨安的新住民，與家人失散，承受著家人生死未卜的恐懼；再加上逃難於此，昔日的物業已付之一炬、落得孑然一身，必須克服適應新環境的壓力，重新落地

<sup>10</sup> 《松隱集》卷 31，《仙林寺記》。

<sup>11</sup> 周密《夢梁錄》卷 10，《防隅巡警條》。

生根。宋人所經歷的苦難使他們的心靈呈現兩種態度，一是尋找心靈上的慰藉，二是尋求預視將來的渴望。臨安的居民們無不嚮往終其一生都能夠跳脫苦難的迴圈，不斷尋找各種事物來滿足這兩種的心靈需求，讓自己的身體能夠及早接受、適應現實環境。從求神拜佛、占卜巫覡到觀賞說唱戲劇，這些活動皆爲了滿足他們這樣的需求。

宋朝的家庭習俗中，有著不成文的規定：凡家中新生的子女都會詳細地記載生辰年月日，向占卦者請示子女的未來。他們認爲，每個人的一生中遇有重大決定時需要生辰年月日預卜一番。如在農曆五月五日出生者，由於此日屬惡蟲之日（蠍、黃蜂、蛇、蜈蚣、蟾蜍），被認爲是犯了凶邪之人，不是注定自殺（屈原，西元前四世紀的詩人，即在農曆五月五日投江自盡），便是注定死於父母之手。<sup>12</sup>《馬可波羅行紀》亦有所載：「杭人風俗，在嬰兒出生之際，其父母便即刻將嬰兒之生辰年月日記下，請教占星數者比對星辰和觀察星辰徵兆，然後將這星象徵兆全部紀錄下來，他日嬰兒遇到重大變故（如經商、遠行、婚配等），便需以前述之星象技士再請教占星術者，如占星術者所言與實情頗能吻合，便依指示去做，奉之若神明。這類占星術者或稱之爲占卦者較適當，在各處廣場倒爲數不少。」<sup>13</sup>

凡有宴慶節日拜祀重要的神明，在鄉間則與城市同時舉行酬神慶祝的表演活動，邀請唱戲、彈奏琴弦、變戲法，扮丑角等表演藝人來此表演與居民、信徒們同歡慶典。人們皆向神明膜拜祈求鄉里風調雨順、五穀豐收，或者向神明許願祈求達成願望，在節日之中，期許自己在神明的庇佑下發達立業。舉例來說宋人對於每年正月十五日，即爲元宵節，特別重視。自宋代開始，由於遊樂時間更爲充裕，東京市民將上元祭祀太一神從黃昏到天明的習俗加以充分發揮。趙翼《陔餘叢考》說：

上元起自魏，因尊信道士而來，即道教有上、中、下三元之說，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火官就是正月十五爲生辰。在宋代，每年正月十五日，皆不可斷極刑事，允許百姓張燈歡樂，人們可以趁著連續假日到街上看燈火、觀賞各類表演。

在朱彧（西元 1084-1102 年）記載了長江中下游的廟戲活動：

又以傀儡戲樂神，用禳官事，呼爲弄戲。遇有戲者，則許戲兒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爇香啟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群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毆擊。

<sup>12</sup>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五月五日生條。

<sup>13</sup> 馬德程譯，謝和耐著，《南宋社會史》，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頁 119。

當時民間宗教戲劇十分普遍，廟戲與道教的「醮」的作用一樣：都是潔淨心靈的儀式，爲了淨化祈福社區。廟戲是爲了娛樂神明，其次才演給人看的。這些神明慶典裡，神廟的露台非常的熱鬧，從藝人輪流上台演出精彩絕倫的戲劇。

佛道兩教普及於民間各地是宋元時代鬼戲發展的基礎。這除了作爲傳達鬼神、宗教觀念，說演者也會利用鬼形象和鬼怪故事來反映現實生活，表達廣大觀眾和個人的情感。佛教的禪宗宗派在南宋時期形成，出現了許多不爲僧的居士，而且不入教的普通百姓中有許多人成了虔誠的信徒。他們信佛不表現在學習佛理上，所注重的是實用。而道教的流傳在宋元形成了近世第一個高潮期，北宋真宗皇帝就下旨編輯道藏，大建宮觀，徽宗甚至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金元時期又是道教各派合流，新派創新期。南宋時期稱霸北方的金國道教兼融儒家、佛教，而創立了全真教，此道派因得到元太祖忽必烈的重視，信眾人數眾多。元代至元年間又出現以符籙爲主的正一派。不論是否信奉佛教或道教還是信奉其他教派的民間都相信鬼神，都影響到劇作家或者表演者都會利用民間對於鬼神的信仰作爲創作的元素來娛樂觀眾。

宋元南戲<sup>14</sup>和元雜劇的劇目總共有八百多種，其中便有爲數可觀的鬼戲。宋元時期有大量鬼戲上演的主要原因，口傳鬼怪故事經過數百年的創作與流傳，到宋元愈演愈盛，再加上志怪筆記小說的發展更讓鬼故事數量可觀。志怪小說乃是文言筆記體的文學，士人們一方面以筆記的形式將其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另一方面自己也創作出不少怪異故事，無論是記錄下來還是本人創作的，都包含著大量的鬼故事。以鬼怪爲主題的志怪筆記或小說都爲宋元戲曲提供了大量的鬼形象、鬼故事題材，從而促進了鬼戲的發展。

說鬼風潮的興起與中國民間信仰之間密不可分。舉例來說，鬼戲中道士作法收妖的情節屢見不鮮，故事中收妖的過程通常描述細膩，或許安排此情節比較能夠激起觀眾的情緒，再加上道教信仰已經融入宋代常民生活之中，安排這樣的情節使故事能具有真實性的效果。在話本《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裡，道士真人設壇提取意娘鬼魂時，除了口中唸一大套咒詞，還寫符籙、擊劍、走罡步等等，

---

<sup>14</sup> 南戲開始於北宋末年形成的永嘉雜劇，南宋、元代時它的影響由永嘉向周圍輻射，杭州、泉州、海鹽等地都出現了富於地方語言、音樂特色的聲腔。據錢南揚先生考證，今知宋元南戲劇目有二百三十八種。這顯然不可能是當時實有劇作的全部。即使這二百多種劇目，有劇目保存下來的（含經明人整理過的），還不到十分之一，另有百多種各存有多寡不等的戲曲，其餘八十餘種則僅剩下劇名而已。中國鬼戲形成於宋金，並於元代成熟，道教在這段時間中盛行，道教於明清開始衰落。宋元時期成熟的戲曲主要分爲南北兩系。在南方流行著以南曲爲音樂體系的戲曲，史稱戲文、南戲或南曲戲文。在北方則流行著以北曲爲音樂體系的戲曲，史稱元曲、元雜劇或北雜劇。元王朝統一中國後，北曲部份演員南下，把雜劇藝術推向南方；與此同時。南戲向北推展。兩種曲戲都擁用廣大觀眾而且長期影響著中國戲曲史的發展和走向。



可說是充滿了戲劇性效果。道教作法事為中國民間鬼神信仰的主要儀式表現，自然也成為說鬼表演中重要的安排。在說鬼表演中，地獄中陰吏鬼差的形象則是依據宋代民間神祇的雜亂體系下產生的。鬼戲中常演到劇中人疑心生暗鬼，為了遏阻鬼怪就用符籙咒語，以防禦自身安危。由此觀之，宋代民間信仰也因著戲劇的力量深植於人心。宋人已經接受鬼戲中所傳達的鬼神觀念，進而接受儒、釋、道三教的宗教思想。因此我們可從這些說鬼表演中，體現到宋人的宇宙觀（cosmological reflection）。

### 三、 社群的建立

宋朝民間的鬼神崇拜活動頻繁。各州縣祠廟香火鼎盛，靠的是為數眾多的信徒出資支持，再加上朝廷也抱持著開放積極的態度看待民間信仰。在謝和耐所研究的南宋時期宗教活動中，他強調，宋代民間信仰呈現多神信仰，民間崇祀保護神的特色在於它是區域性的，也就是說為了特定地區的繁榮而膜拜。民間奉祀的諸神眾多：古聖賢、大詩人、英雄壯士、對鄉里有功之人，道教中的神仙，佛教中的聖哲高僧、神明、土地公、城隍爺等等，這些神祇又與當地山川土地的神靈互相融合。宋人的宇宙觀裡，認為山川丘陵、河川、溪流、巖石，皆有感應靈氣，能預示吉凶好壞。宋人建立奉祀祖宗的陵墓、宗祠、各類佛、道神明的廟宇以及祭祀歷史人物的寺觀，主要是為了向神明、祖先祈求庇佑。每個神明都有它保佑的區域及事務，如朝廷所主持的官方祭祀及一般人家的祭祀便是為了求神明幫助免於戰爭、疾疫等各種災禍的侵襲。宋人會為過世的親人選擇座落方位良好的墳墓，以庇護家族子孫的命運。另外，宋人也會向提供特殊目的之用的神祇祈求保護免於各種禍害，或盼望發財致富，或求生男嗣，祈求科舉及第等等，也有的可能冀求寺廟神明獲取有用的啓示。赴科考的書生，考前睡於廟中，以求托夢指示，法官審案為求神明指引誰為真凶，也會宿於廟內。值得一提的是，凡建造房屋、城牆、寺廟甚至是墳場，都會祈求神明的或是只是透過占卜者、風水師請益，怕的是違背了天地秩序。

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中談到中國人對於宗教的基本態度，他認為，中國宗教生活似為一種潛在的，未曾言宣的不安情緒所縈繞。懼於天地失序，山海易位，四時失調，宇宙頓成洪荒的可能，各類宗教儀式的舉行便是避免這樣的情景發生。在宋人的眼裡，神明的力量是不可測，超乎自然的，所以他們一切的宗教信仰和習俗無不傳達敬畏懍慄之心。謝和耐認為宋人對於宇宙的概念，與同時期的基督教文化裡重視人神間交往溝通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宋人的生活裡，明瞭吉利百順的節候，吉祥的日子、方向、地點顏色、數目、名字是一切行事的要訣，宇宙萬事萬物息息相關，有不可思議的神力關聯著。預兆顯示著未來，名字稱號的意義會成為事實，取名命字以趨吉避凶，甚為審慎。

宋人崇祀神明為求庇佑為主要的宗教形式，但在宋人的宗教生活裡還有因著信念期盼所激發出的祕密結社和幫會活動。這些活動具有狂烈的熱情和強烈的信仰意識，會透過齋戒、起乩、狂舞等儀式作為與神直接交往的途徑。這一點使得宋代的民間信仰中出現了許多依附於神明，為神明工作的社群，成為宋朝另一個重要的宗教特色。

## 神廟、道觀、寺院

南宋時期臨安是最大的宗教中心。神廟數目超過其他城市。根據《咸淳臨安志》71-75 卷與《夢梁錄》卷 15 統計，臨安城內外的廟宇數量，佛教寺院 447 所；尼院 31 所；庵有 13 所。道教宮觀 24 所；女冠 9 所；道堂有 32 所。此外皇帝祭祀用的大寺觀有 10 所。其他神寺；土地神寺 5 所；山川諸神祠有 16 所；節義祠有六所（《咸淳臨安志》記載有 5 所；仕賢祠約 47 所（《夢梁錄》載 7 所，行祠 40 餘所）；古神祠 10 所，東京舊祠 6 所，土俗諸祠於《咸淳臨安志》所記有 30 所，外郡行祠有 22 所，所有神廟一共有 699 所以上。這些僅是官方認可的，還有民間私建、不合法的廟祠比起官方神廟更多。從廟祠種類來看，佛教的影響力比道教來的更大，信徒更多。不過民間神祇的力量也不容忽視，可推測南宋民間祀神的信仰相當多元，種類眾多，從名山大川乃至於聖賢人物，無一不信，無一不祭，所創造出的神祇數量之大。

不論是民間還是朝廷都積極參與造神，所有神明皆由皇帝賜以官名，名號各異，字數多寡不同，皆用以表示等級。欽定名號是皇帝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朝廷為了要端正世俗，積極取締淫祀、控管民間信仰。朝廷中負責主要審查地方祠廟，審定地方祠廟合法化及加封升等的機關是太常寺與祠部。<sup>16</sup>整個審定程序必須由地方人士向州提出申請，州將文書上繳各路轉運使，轉呈給中央。需針對申請的事蹟內容，進行兩次驗實的手續。在確認神蹟後，由太常寺擬定廟額、爵號名稱，交由祠部郎中、員外郎覆核稱號是否妥當。<sup>17</sup>關於須針對申請的事蹟內容，進行兩次「驗實」的手續，是作為判斷神明的法力是否屬實，這一點是相當有趣的機制，因為這樣的證明只能端賴人際傳播，由下而上來獲取認可。所謂的「驗實」是無法完全將事實確證，都必須由民眾的輿論下作為判讀。這無形地讓宋朝的神

<sup>15</sup>馬德程譯，謝和耐著，《南宋社會史》，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sup>16</sup>《宋會要輯稿》職官十三之 16，及《宋史》卷 163〈職官〉三〈禮部〉：掌天下祀典、道釋、祠廟、醫藥之政令。……若神祠封進爵號，則覆太常鎖定，以上尚書省。」

<sup>17</sup>《宋會要輯稿》禮二 0 之 7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條：「諸神所禱，累有靈應，功德及人事蹟顯著，宜加官爵、封廟號者，州具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即具保奏。道釋有靈應加號者。」

廟、道觀及寺院必須端賴著靈異傳說來吸引信徒相信，才能使朝廷承認其具有靈應的法力，以便合法納入民間信仰的系統之中。

洪邁《夷堅志》<sup>18</sup>提到幾則承認神祇機制的故事。湖州城外某村有一位船夫名叫褚大，有不孝的惡名。據說有一次他母親落水，他竟坐視不救，還是一位過路人救起他的母親。西元 1174 年某日，褚大載客棹船剛離開岸邊，有一人飛奔而來要求搭上船。褚大貪圖船錢，回頭讓他搭船。船行駛到釣台這個地方，這個人突然開口說話：「我乃神，非人也，以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大殊不懼，猶應之曰：「便是天神，也還錢乃可去。」語才一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于烏程尉木曷，來驗其事。洪邁沒有說明同舟人是誰，可能是一般平民。因為凡所有命案都得上報地方官。同舟的人向地方官報告神明的神威，地方官聽到這傳言，樂得自己終於可以回奏朝廷求證有關神祇靈蹟（驗實）有了結果了。宋代的官員通常都會毫不猶豫上奏朝廷神明的神蹟，加封神明。南宋的封神制度裡，不是所有祠廟神祇都能立刻得到封號，而是建立「先祠廟後神祇」的原則，必須先讓祠廟合法化，再封神。宋朝階段式分封神祇，來管理天下祠廟，神祇的爵位也按照封建制度來策封。由祠廟封號，便能清楚地掌握其位階如何，並鼓勵神祠更上一層樓。朝廷按照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太常博士王古提出的方案<sup>19</sup>，以及南宋高宗建炎年間增修案作依據，南宋高宗在位後，民間道教信仰盛行，再定「神仙封號」。<sup>20</sup>傳達了「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也就是說明神明必須由皇帝封策的意思。「神」也納入了國家體制中，必須尊奉於皇帝（天子）。鬼神也必須服膺於國法。汪藻〈虔州神惠廟記〉裡說道：

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能，無相瀆也。故人之能興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能致福弭災者，時則賜之幽，有顯號徽稱，以昭明也。屬之祠官，世世不絕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肆。虔之為州，去京師數千里，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璧之薦者。<sup>21</sup>

<sup>18</sup>洪邁《夷堅志補》卷 13，〈褚大震死〉。

<sup>19</sup>《宋會要輯稿》禮二 0 之 6~7 元豐三年閏六月十七條：「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賜命馭神，恩禮有序，凡古所言，皆當於理。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

<sup>20</sup>《金石補正》卷 117〈渠渡廟賜靈濟額牒〉：「神祠遇有靈應，即先賜額，次封侯，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公，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王，每加二字，至止八字止。神仙即初封真人，每加二字至八字止，婦人之神則初封夫人，二字至八字止。並本寺條節文，道釋有靈應，合加號者，並加大師，先二字，每加二字。」

<sup>21</sup>汪藻《孚溪集》卷 18〈虔州神惠廟記〉。

此處的意思，神明與國家關係各司其位，幽冥的力量必須保護人民，以人民福祉為重。神明不能祐民，理應罷輟祂的位格。

官僚等級制度深入到宋代民間信仰之中，宋人會認為神明的威力會因為朝廷受封的等級有所不同。就以宋代城隍信仰<sup>22</sup>為例，因為帝王賜加封號給「城隍」，將城隍神信仰納入國家祀典之中。自宋代起，各州的城隍神，則由凡間帝王直接的封賜，或由民間善信推舉出來，且經由官府認可才能成為該城的保護神<sup>23</sup>，這樣的遴選方式令「城隍神」感覺較為平民化。自宋代以來，城隍神不僅有「平民化」的趨勢，甚至有「人性化」的現象。原本不食人間煙火的城隍神，也開始有了七情六欲，城隍娶親的故事也經常出現在民間傳說故事中。在「屢易其神」的城隍體系中，城隍神具有任期制，擔任城隍神者都必須透過推薦及考試的方式選出，政府並無統一的遴選規定，各個城市可以自行決定。例如南宋淳熙年間，李異為龍舒長官，廣受民眾信賴。死後，當地人便把他當成城隍之神。各地城隍的封爵不同。以臨安的城隍為例，南宋初年封為保順通惠侯，到了南宋末年加封為顯正康濟王。吉州的為威顯英烈侯，台州的封為順利顯應王。<sup>24</sup>

宋代長達三百年的造神運動，造就出龐雜多元的祀神系統，官方與民間積

<sup>22</sup>中國民間和道教信奉的守護城池之神。《說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城隍神的奉祀，古人有始于堯，始於漢，始於三國諸說，然所據不足，無可憑信。有史可征者，約在南北朝。《北齊書·慕容儼傳》載：「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儼鎮守鄆城，被南朝梁軍包圍，梁軍以荻洪截斷水路供應，形勢危急，『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沖風歛起，驚濤湧激，漂斷荻洪』」。這是關於城隍神顯靈護城的最早記載。唐代奉祀城隍神已較盛行。《太平廣記》卷三百三之宣州司戶條引《紀聞》稱，唐代「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唐代地方守宰多有撰祭城隍文，祭祀城隍神者。開元五年（717），張說首撰《祭城隍文》，其後，張九齡、許遠、韓愈、杜牧、李商隱等繼之。李陽冰、段全緯、呂述等撰有《城隍廟記》，杜甫、羊士諤有「賽城隍詩」。唐代信仰城隍神已成習俗，以致「水旱疾疫必禱焉」。五代十國時期，城隍神已有封號。據《冊府元龜》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三》載：「後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詔杭州護國廟，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順義保甯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闡王。漢隱帝乾祐三年（950），海賊攻蒙州，州人禱於神，城得不陷，故封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

<sup>23</sup>據《宋史·禮志八》載：「自開寶、皇祐以來，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並加崇飾，增入祀典，州縣城隍，禱祈感應，封賜之多，不能盡錄。」

<sup>24</sup>宋趙與時《賓退錄》卷八謂宋代城隍：「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又云：「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甯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範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玉……」

極推動。宋代的造神運動裡，創造神明沒有一定的準則。僅能大概整理出幾個基本條件：要成爲一位被人信奉的神明，得必須是一、恩惠於民；二、爲國爲民捐軀；三、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四、在抵抗寇患中立功；五、抵禦天災疾病中表現傑出。因此，即便是底層平民，只要是眾人公認對地方鄉里有功，死後便有機會被人立廟供奉。由此看來，死後究竟爲神還是爲鬼，這之間的界線在宋人的眼中是相當寬鬆的。人人皆可成仙，並非可望不可及。

## 節慶與廟會

宋代城市中宗教集會活動非常頻繁，重大的宗教節日往往都集結千萬的信徒與遊客。其他的城市雖說不如東京臨安那樣頻繁，但基本的神祀活動一定會舉行。就以臨安爲例：

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信徒會到承天觀進香。

二月初三，梓潼帝君（文昌神）誕辰，四川籍的官宦集會燒香。

二月初八到十三日，霍山崇仁真君張渤（又叫桐川張王）的生辰，朝拜活動最爲盛大。

二月十五日，長明寺與其他一些佛寺舉行佛涅槃勝會。

三月初三，則是上巳日，又是北極祐聖真君生日，各道教佛教廟宇打醮設會。諸軍寨以及殿前都指揮使司也奉香火集會。

三月二十八日，東嶽聖帝生日，盛大集會。遊行隊伍有許多人裝扮神鬼。甚至有人裝扮成罪犯，銬著枷鎖，表演被神明懲罰，展開著奇特的化妝遊行。

四月初六，臨安城隍神誕辰。大集會。

四月初八，佛祖誕辰，各寺廟舉行浴佛會，西湖舉行放生會，常聚集數萬人。六和塔集童男童女，信徒舉行朝塔會。

四月十五日，結制日。佛殿建楞嚴會，至七月十五日解制。

六月初六，磁州崔府君生日，閭門外顯應觀，貴戚士庶多來獻香化紙。

九月二十五日，五王誕辰。

十一月一日鬼節。

上述節日絕大部分是祭拜陰間鬼神的活動。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後，輪迴和地獄觀念逐漸流行，佛教中的鬼與中國本土的鬼逐漸融合，形成一套十分完整的陰曹地獄體系，各式各樣的鬼靈開始有了具體形象。道教有一套以酆都大帝、東嶽大帝爲首的鬼神系統，自唐宋以來慢慢與佛教鬼神合流，佛道鬼神齊聚，共同管理陰間鬼事。中國的宗教信仰使得鬼怪觀念的產生與存在，逐一地理論化和事實化，使人們漸漸地信以爲真，誠惶誠恐。

## 道士、法師、術士

宋代，當人們需要幫助時，都會求助各種的宗教人士。究竟是要直接向神明祈禱，還是要求助道士、法師、術士的協助呢？關於這點，宋人並沒有絕對的信仰，完全是考慮這些神祇或宗教人士的聲望高低，以及收取的費用而定。也就是說，即便是不同信仰的人，亦可向自己信奉之外的神祇或宗教人士尋求幫助。這並不牴觸，只要能夠驅除妖魔、達成心願、治好疾病，他們都願意付錢邀請這些不同宗教人士。

南宋時期，因為民眾的宗教需求高漲之下，人人都想藉超自然的力量得到幫助，因此民間對佛、道二教採取折衷作法，例如人們在家人生病時會喚請僧人及道士，來持誦經文、舉行儀式以及書寫符籙，他們尋求各類宗教的儀式祈禱家人能逃過劫數或者盼望家人能死後進入極樂。由於大小之事，都需要宗教人士協助，使得南宋時期的民間宗教人士越來越多是文盲且未經訓練的人，他們自稱是無師自通，得到神助受有通天之能。在宋人的眼中，這群宗教人士管他識不識字、懂不懂經書，他們認為道士也未必一定要有知識才能，只要他們的法力真的高強，符書真能靈驗，的確有通天之能，他便是貨真價實的通靈師。

道士、法師、術士遍佈各街坊，不一定都聚集在寺廟附近。《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御街應市，兩岸有術士百餘人。」句中「應市」應該是因應百姓需求而成的一條集聚術士的街道。相士、道士皆沿街相命、賣卦為業。《夢梁錄》就記載：「又有盤街賣卦人，如心鑑及甘羅次、北算子者。更有叫『時運來時，買庄田，娶老婆』賣卦者。」他們沿街用口號招攬生意，引人注意。宋代商業發達，職業分工細密緣故下形成了行會組織及同業聚集一處的文化現象。再加上商業營業時間、地點不再受限，這些宗教人士亦能在晚間營業，與商販、路歧人一樣在夜市裡打滾討生活。<sup>25</sup>在《西湖老人繁勝錄》條列的臨安各個行市中，也有「卦市」出現。當時臨安有四山四海：衣山衣海（南瓦）、卦山卦海（中瓦）、南山南海（上瓦）、人山人海（下瓦）。中瓦竟以卦山卦海來形容，可見宋人的占卜文化充滿了活絡的商業氣息。

宋代從事宗教信仰的人數相當可觀，這其中也充斥著裝神弄鬼，詐騙錢財，甚至謀財害命的宗教斂財者。許多偏遠地區，在巫師蠱惑煽動下，流行殺人祭鬼

---

<sup>25</sup> 南宋吳自牧著《夢梁錄》，卷十三，〈夜市〉條，所記載，當時臨安（今杭州），夜市十分盛行，應有盡有。僅從食攤來看，各攤經營各有分工，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冬季亦有夜市，盤賣至三更後，除了固定攤外，還有頭頂肩挑沿街串巷叫賣的小擔。這時的夜市，凡白天能買到的商品，晚上幾乎都能買得到。其中：「大街上更有夜市賣卦：蔣星糖、玉蓮相、花字青、霄三命、玉壺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簡堂石鼓、野庵五星、泰來心、鑑三命。」可見臨安城裡，也有女子擔任相士賣卦算命。

的儀式。<sup>26</sup>時有聽聞用巫術詛咒人得病或死亡，類似今日降頭一類的巫術，流傳於不少士大夫之間。巫師們「厭勝詛咒，作孽興妖」，李姓學諭居然信以為真，認為「謂其父病之由，起於師巫之咒，釘神之勝，則父之痛在脅，釘神之心，則父之痛在心。」<sup>27</sup>每到京城舉行科舉考試，考生們除了狂熱崇拜神祇之外，也會透過扶乩降筆與神明溝通，或者祈求神明透過夢境啓示，一般稱之為「求夢」、「祈／乞夢」或者是「謁廟求夢」希望能透過神助預見到科考題目。附帶一提，在宋代有許多廟宇備有專門給祈願者過夜祈夢的廳室或樓閣。除此廟宇也會提供祈願者用杯筊和靈籤與神明溝通，不過這樣的方式在宋代僅是初步發展的階段，信徒們並不太使用，可能是籤文、杯筊較難獲有具體的答案。

這些道士、法師、術士之人通常都會先自稱自己已得到神明的啓示，擁有招引功名顯赫的亡魂之法術，或者說自己能扶乩卜筮每個人的前生未來。在宋代宗教習俗裡，在這些人之中往往是社會地位最為卑微的人。他們之中不少是瘋癲癡愚者、遊蕩在外的乞丐或是窮困無知的小販，他們自稱遭遇到神蹟和通靈的經驗，他們會藉由一些奇異的招魂儀式、卜卦預言讓人們相信自己的確受到神啓的力量。自宋代起，每位從事宗教信仰的人都極為講究這些手法，使得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這些神啓者的法力，他們希望透過神啓者的轉達來明白神明的意旨；希望與神明溝通來瞭解他們的祈求。宋朝的信仰習俗裡，信徒們普遍瀟灑著驚怕謹慎的宗教情緒，他們期待在這些神啓者精巧安排的宗教儀式裡，目睹體驗到神蹟。這些神啓者也因為透過尋求神祇靈應的手段來博取人們相信，使更多的人提供物資財力來加入宗教活動，供養他們的生活與他們的神明。

## 第二節 城市的時運——香港

西元一二七八年，再過一年南宋就被滅亡了，南宋最後一任祥興皇帝，在蒙古兵追逐中逃到廣州的新會縣地方，西元一二七九年，南宋降元的將軍張宏範率蒙漢兵追到新會，那時，祥興皇帝及他的隨從，曾到九龍灣，登陸，在一座山駐紮，九龍灣的陸上那一座山崖，後來被稱為宋皇台，那宋皇帝名趙昺，還是小孩子。同年，南宋軍在新會山崖潰敗，大臣陸秀夫便抱著小孩子皇帝跳海自盡。——據說那最後一場戰役，也在九龍灣進行。宋皇帝身死國亡，留下宋皇台，但香港移山填海，把宋皇台山崖給炸破了，填了海，僅留下山崖上一塊方石，刻上宋皇台三字，移放在啟德機場旁邊的宋皇台道。宋皇，留了一塊石、一條路，作為紀念。

<sup>26</sup> 《宋會要》刑法 2 之 3-4；《名工書判清明集》卷 14，〈行下本路禁約殺人祭鬼〉提到：「巴峽之俗，殺人為犧牲以祀鬼，以錢募人求之，謂之采牲。」荆湖南路一帶，「所在鄉村，多有殺人祭鬼之家，平時分遣徒黨。販賣生門，誘略平民」，且「斃割烹炮，極慘酷。」

<sup>27</sup> 《名工書判清明集》卷 14，〈巫覡以左道疑眾者當治土人惑於異者亦可責〉。

<sup>28</sup>南宋詞人姜白石寫到「越只青山，吳惟芳草，萬古皆沉滅。」姜白石他的時代，便是如此沉滅了，留下僅是殘缺的古跡，有誰會記得呢？

## 一、人口的變遷

它，只是一個靠著大海的小漁村，因為《南京條約》而改變了它的命運。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香港的發跡並不光榮，是因為鴉片加上不平等條約才讓它飛黃騰達起來。自西元1842年起，英國人給了香港擠身成為國際城市的機會，讓居住在這裡的人都能自由的賺錢，處處都是發財立業的機會。從太平山往下望去，香港與九龍之間——中國最優良的海港。它最狹長的地方，縱深一千公尺長，移山填海把這個只有三、四百公尺的海灣延伸成深闊的海港——維多利亞港，使得來自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船隻經過太平洋都得在這靠岸停泊。

西元1843年，英國派第一任香港總督之後的人口調查，紀錄當時的香港居民只有三千六百多人，而今增加到達六百多萬人居住於此。在西元1949年之前，香港是一個以轉口貿易為主的城市，既是少數有錢或有政治原因的中國人逃避內戰兵火的臨時避難所。西元1949年，香港面臨一個重要關卡，那年共產黨統治大陸，香港突然面臨到這樣的大震盪，有大批大批的難民從內地跑來這。打從那時起，移民們已不再把香港當作臨時的避難所，而打算在這裡落地生根。因此同年起，新建許多四層高的屋宇分層賣或租予由大陸來的難民居住與做生意。香港的建設，開始於五〇年代，在這三十年裡，香港人至少把香港翻新兩回，把原先只有四層樓高的屋宇，在商業集團的收購下，一一拆除，重建成十層樓以上的高樓大廈，接連地又把原十層樓高的高樓改造成二十層以上的高樓，就這樣，從十層級，八到十五層之間，二十層級，十八到二十五層之間，有許多在西元1949年以前建造的樓房，依著這樣的模式翻新了起碼三次以上。

這三十年間，香港經歷許多的災難，例如：西元1962年的難民潮，大量大陸難民如潮浪般湧入香港，估計短短半個月有十萬人流入，那時香港人稱為「五月難民潮」，西元1965年出現了銀行擠兌潮，香港大批居民向銀行排隊提款。西元1967年的暴亂，因為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狂流侵入香港。西元1973年香港股市崩盤，因為全世界發生能源危機，嚴重地打擊香以出口作為主要經濟基礎的香港。西元1983年中國農曆年節，五十萬香港人「回鄉探親」，其中將近四十萬人乘著火車由香港進入中國大陸在短短五、六天裡進出，小小的香港一年至少有一次這樣多的人集中入出境。到大陸去稱為回鄉，從大陸出來的又稱為回香港。香港人願意排隊一日購車票而回鄉幾天，然後，又回到居住的香港。在97年未到之前，香港人在殖民者的政治自由和經濟開放下，創造了繁榮的奇蹟。

---

<sup>28</sup> 漢元 《香港的最後一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4），頁 26。



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香港來，西元1980年十月之前，凡是從大陸偷渡進入市區者，便是香港人，這稱為「抵壘政策」。當時，在邊境被捕的偷渡者（在未進入市區前被捕），平均每天有四百五十人，八〇年代起，撤銷了該政策，嚴查身分證明文件，市區內只要一發現可疑人物，便要求示出身分證明，若是查驗為偷渡者，立即扣留遣返大陸，那時起，邊境所逮捕到偷渡者，每天平均二十一人。西元1967年起文化大革命，相繼十年裡獲准居留香港的大陸人大約五十萬多人，當時香港政府稱他們為新移民，並要求他們必須住滿七年才能正式獲得香港公民證。當時這批人在香港的生活困苦，深受本地人歧視，諺稱為「大陸圈仔」。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期間，香港社會中，移民者遭受到異樣眼光的情形一直沒有終止過，這是新移民必須面對的第一道關卡，忍受社會歧視。

現今香港的市民，只有先來後到的差別，這兒大多數是為了解脫貧窮的內地生活，設法遷移到香港這裡賺錢討生活，這些移民者一心嚮往能來到這裡抓住機會，從此過著富裕的生活。他們能忍則忍，安於現狀，設法在夾縫求生。香港學者郭少棠（1996）表示，「一代一代流入的難民，在香港有一種寄居人下，活在夾縫、得容忍處且容忍，選擇生存自由多於政治民主的心態。」香港移民抱著「過客」的心態，渡過了英殖民地的時期。

## 二、土地的增加，向海爭陸

自國共內戰爆發，迫使許多人湧入香港，他們大部分來自廣東省、上海等中國重要商業城市，使得香港人口大增，因此英國政府除了不斷地向海爭陸，增加腹地以外，市區裡積極開發商圈、建築高樓，不斷地往上增加樓層；讓商圈發展更為稠密，使香港能夠容納更多的移民人口。歷經百年的發展，香港，這座城市的整個面貌：各式各樣、風格獨特的摩天大樓密密麻麻地落立在寸土寸金的商圈之中，以及充斥著成群連棟公寓如海浪般一波又一波地向海平面或山丘層層綿延而去。

香港全島，本來是有幾處峰巒的山，北面山坡的斜地，原來約有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間，經過百多年來不斷地填海，填出來的平地，最闊處有四百公尺以上，在德輔道中與海之間，填出了兩條平行的道路，那是遮打道和干諾道，而遮打道的全長有四百五十公尺（經過拓長才有這麼長），這短短一條街，東邊一段本是碼頭區水與岸。西邊一段為填海而成，香港人將這一塊地區稱為「中環區」。<sup>29</sup>早至1851年，英國派駐香港的文咸總督（George Bonham）便從事填海工程，那時填海而得的土地中，有一條街便以文咸作為命名的街道，文咸西街及東街，為最早期的商業中心。而今的中環區以填海拓寬成東西各六百多公尺長，東面以直街

<sup>29</sup>漢元 《香港的最後一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4），頁:42。

昃臣道、花園道作起點，西面至畢打街，這一個街區是香港主要的商業中心。在這裡匯集了許多銀行（匯豐、恆生、渣打、中國銀行）及企業總部、政府機關，畢打街碼頭，為最早期的水陸中心，而德輔道，干諾道中段這塊地區是在1890年填海而成。香港城市發展過程，不斷地向東，向西擴展，金鐘以東的灣仔區，再向西到銅鑼灣區，又折向北入英皇道到北角都是市區，而銅鑼灣是人口密集的地區。

西元1953年聖誕節，九龍石硤木屋發生大火，超過五萬居民一夜之間喪失家園，此地區的住民多以低下階層的市民為主，很多是剛從內地逃往香港的難民，香港政府為了安置大量的貧困災民，建立了香港的公共房屋計畫。從同年起，建立許多公共住宅區，分別在黃大仙、橫頭磡、石硤尾、藍田牛頭角、彩虹等地區，提供給香港一般、低下階層的市民居住。西元1965年英國政府採自由放任政策，讓香港發展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公用事業相繼開辦，如香港中華煤氣公司、中華電力公司、電車公司及廣九鐵路等。在教育方面推行公立學校制度，補助中文學校經費，後來教會營辦的學校也在補助計畫中。香港慢慢地轉形成服務業型態的城市。西元1970年起，香港積極建設成現代化的城市，不論是基礎建設、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方面建立制度、組織，使香港帶來新的活力，中產階級的力量得以抬頭。香港逐漸轉型成爲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有許多高價樓宇座落在填海新生地上。在西元1990年最新的填海計畫，維多利亞港邊填海造地計畫，完成了35公頃的第一階段工程。九龍西部也擴增到三百多公頃的新生地，目的要興建連接新機場的鐵公路，機場本身有九百三十八公頃的新生地。王韜<sup>30</sup>在英國殖民香港的初期時，曾這樣說道：「山區與海洋之間的平地很少，歐洲人艱辛戮力，在此處設計規劃並大興土木，其堅毅不拔，直如孜孜不倦銜石填海之精衛鳥。」事實證明王韜預言成真，或許真有一天香港和九龍可以相連。

### 三、統治者的移轉

香港的前途問題支配整個八〇年代。西元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西元1997年必須要回歸中國，脫離英國殖民的政治狀態。那天起，香港人把回歸中國那一天意味著「大限」將至。

---

<sup>30</sup>王韜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原名利賓，字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弢園老民等，吳縣甬直人。王韜接受英國傳教士麥都思邀請，來到上海墨海書館，從事編譯西學書籍工作達13年。太平天國運動中，西元1862年2月4日，他具名蘇福省儒士黃曉上書太平軍，出謀劃策。清廷搜獲該信後下令通緝，王韜以「聖朝之棄物，盛世之罪人」身分，於西元1862年10月4日乘船逃離上海，開始了長達23年的流亡生活。其間他主要居住在香港，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促進了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

在香港人內心裡或許會這樣地想著：「一切的開始，總有那麼一天會結束。」香港的開始是西元1841年1月26日<sup>31</sup>，那結束是在何時呢？這個事件造成最大的變化是香港對中國的態度改變了，香港要面對自己的歷史。有許多的香港人在97回歸中國之前，移民到加拿大、美國或澳洲。有些人計畫在取得外國護照，買了政治保險後，馬上回香港去。八〇年代初期，香港人因為焦慮著香港前途問題，使得股市、樓市低迷了一段時間，直到西元1987年爆發全球經濟危機為止。在那時，香港慢慢地穩定了腳步，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抓到新的機會。它知道中國的經濟即將要起飛，它可以坐穩中國門戶的地位，並取得華人經貿金融中心的位置。八〇年代中，中國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香港作為中國全部出口貿易的吞吐港。羅汪·卡力克認為，「殖民的經歷塑造了香港，但它與中國卻依舊有著臍帶相連的關係。」<sup>32</sup>

自西元1949年到1980年代初，香港與中國之間猶如東西德一樣隔著籬網，兩個迥異的世界。過了1980年後，中港的經貿關係已發展成密不可分，它們因著雙方的經濟利益而結合。政治上，香港仍有本身特有的「認同感」(Identity)，香港人不是真正的英國國民，他雖是中國人，但並不認同共產黨政權，只因西元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使他們再度地將「領治權」交由給中國共產黨政府。民族主義在香港人心目中並不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樣的政治處境，使得香港人只能著眼於自己和家庭的利益而打拚。香港的政治宿命裡，它一直受人擺佈。香港，商業利益總是凌駕於東西文化及政治意識型態之上。

香港人對政治冷感，乍看香港是一個重經濟、輕政治的城市。這或許是因為香港人的生活壓力大，再加上「移民社會」的緣故。香港人對於香港這塊土地的歸屬感，除了戰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新生代外，香港人口中相當多是從中國大陸遷移而來的新移民，生活的擔子是新移民整日操心的所在，因為初來到香港還未能完全適應，更別談說希冀能夠共享香港社會的繁榮富裕。

#### 四、冷調的身體——滿天神佛、百鬼夜行

香港的民間宗教信徒大部分在香港以外地區出生。這除了與年齡有關外 (Hui 1991: 106)，也印證了Lang and Ragvald (1993)所提出的說法：本地民間宗教所敬拜的神祇，例如黃大仙，原先是「難民神祇」(refugee Gods)，祂在來自中國移民和難民中間大受歡迎。由於大部分難民與新移民經濟狀況較差，再加上失去原有的社區網路與親屬關係，所以容易信奉宗教；而中國神祇能以他們

<sup>31</sup> 西元 1841 年 1 月 26 日，英國軍隊在香港島的西區水坑口登陸，首次佔領香港。

<sup>32</sup> 羅汪·卡立克著，張慧英譯《在洋紫荊旗下：香港資本家的選擇與未來》(台北：時報，2001) 頁 11。

所熟悉的傳統習慣來幫助他們。<sup>33</sup> 如今全港共有超過 360 間民間信仰廟宇。(Luk 1990:567) 其中，黃大仙廟規模宏大，其位於交通方便的市區，廟內提供免費醫藥以及占卦算命等服務。Lang and Ragvald (1993) 調查指出，在九〇年代初，到黃大仙占卦算命的人增加了兩成，當時占卜先生認為與六四事件有關，多數的人會詢問移民機會和應否移民的問題。由此可知香港的宗教活動的擴展與社會、政治狀態息息相關。鄭明真、黃紹倫調查報告中<sup>34</sup>，指出香港人（包括非宗教人士）大多無意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命運等形而上的問題，大多數無宗教信仰的人在價值觀方面較為著重於物資、金錢和自由。他們大部分都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主宰，並接受因果報應之說。香港人普遍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的說法以及相信宇宙間有某種的道德秩序，人必須依照這套法則來行事才能擁有順其心意的人生。<sup>35</sup>

香港人相信運氣和神佛保護，以及祖墳到住宅的風水。在香港，建屋或拆屋，或新開張的公司和商店，都需要風水鑑定，以及和尚來作法事。就以香港匯豐銀行為例，他們門前兩隻巨大的銅獅則是請「風水師」來看移獅的堪輿方位而成。對於到廟宇拜神、相信風水等宗教習俗可以說完全融入於家庭及個人生活之中，甚至以將宗教或神聖的事物與世俗事物交織在一塊。拜神和風水日漸商業化，滲透於家庭或個人生活中。其中所反映是民間宗教單向的世俗化過程，更是神聖事物延伸甚至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去的趨勢。

道教<sup>36</sup>在香港普遍流行，信徒遍佈社會各個階層。人數分佈於香港本島、九

<sup>33</sup>見鄭明真、黃紹倫著，〈香港人的宗教信守與情操〉，陳慎慶編著，《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出版社，2005），頁.35。

<sup>34</sup> 同上。

<sup>35</sup>圖表為 1995 年調查香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習俗者（%）對於以下四個問題的回應：1. 是否有祭拜祖先的習慣 2.在過去一年中，是否曾黃大仙廟或其他廟宇參拜？3.你是否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4.你是否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宗教組別	祭拜祖先	參拜廟宇	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	相信因果報應
沒有宗教信仰	49.5(210)	43.5(184)	67.3(284)	74.5(316)
中國民間信仰	87.8(115)	60.3(79)	77.1(101)	81.1(107)
佛教	79.5(62)	76.6(59)	78.9(60)	89.5(68)
新教（基督教）	9.8(6)	6.6(4)	91.8(56)	77.0(47)
天主教	18.5(5)	3.7(1)	73.1(19)	76.9(20)

\*p < 0.001, \*\* p < 0.05(  $\chi^2$  測試的有效水平)

選自鄭明真、黃紹倫著，〈香港人的宗教信守與情操〉，陳慎慶編著，《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出版社，2005）。

<sup>36</sup> 香港的道教分爲三個派別：全真教、先天道、純陽派；全真教中則以龍門派最爲活躍，先天道

龍半島、半島以北的新界地區和一些離島，尤以香港島北部和九龍半島南部，主要為香港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發展。香港的道堂、道觀集中在鬧市，如香港的灣仔、上環、西環，九龍半島的旺角、深水〔土步〕等地區。一般香港居民都很熱心參加道教的各種活動，不少人甚至成為道教信徒。在很多的私人的神壇或神龕裡，都會將儒、釋、道教的神像混雜在一起祭祀，香港的民間信仰亦屬於多神信仰的特色。香港有頗多江湖術士，一般自稱系出茅山支派清花派，也有江湖組織的流民派，皆標榜自己是道教傳人，以道術為招徠。黃兆漢、鄭煒明考察香港道教，歸納出香港民眾崇祀道教神明則以呂純陽祖師（孚佑帝君）和赤松黃大仙，其次為全真祖師王重陽等，而三教聖神中則以佛教觀音大士最受歡迎。<sup>37</sup>

香港民間信仰亦有集體祭祀以宗祠或區域的保護神的習慣。民眾固定向家鄉的地方神祭拜崇祀，祈求神明（土地神、城隍等）保佑。每逢神明誕辰，地方上的民眾會為神明舉辦廟誕或打醮<sup>38</sup>。廟祠舉辦的儀式都必須經由專業人士主持。在那天會邀請法師、安置神明、給神明及亡魂焚燒祭品，樹立紙紮的大士（吃鬼者，負責維持亡魂的秩序）祭神時上演傀儡戲、歌戲等。打醮舉行五日中，邀請地方民眾免費膳食。「打醮」比其他節日更具體呈現出地方的精神，該地方的住民將日常生活與地方信仰融合為地方社群意識的表徵。

以香港的新界、沙田、大埔林村為例，分別從城市的中心到城郊外，會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熱絡的民間信仰生活充滿了地域色彩。

---

則是禮賢堂為主，純陽派則分為蓬萊派和太乙門兩派。先天道信奉觀世音大士，屬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是香港頗為流行的道教教派，一樣也是三教合一。純陽派是祭拜呂祖，在香港的道教祖師尤以呂祖最受推崇他是道教北宗的遠祖，金元時期，王重陽便是繼承其道而開創了全真教。他改革了道教原先的教義，他的教義裡把慈悲度世視為成道路徑，改丹鉛與黃白之術為內功，改劍術為斷除貪嗔痴等煩惱的智慧，呂祖對北宋以後的道教教理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再加上呂祖是民間熟悉的八仙之一，歷代有關呂祖的顯靈傳說非常多。現今香港不少道堂道壇常常請祂降乩。香港道教三派所崇奉對象甚多，上至清人，下至歷代仙人，一爐共治。

<sup>37</sup>見黃兆漢、鄭煒明著〈香港的道教〉陳慎慶編著《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出版社，2005），頁：89。

<sup>38</sup>「打醮」字面上意思是祭祀，其中包含了一連串的儀式，一般人認為打醮是為酬謝神明和祭祀亡魂的。科大衛（David Faure）〈宗教與地域的表徵〉一文認為：「『打醮』亦可看成某種形式的集體祛邪。當地的民眾會將此視為對生者和死者、神明和鬼物的施予。就法師所進行的儀式來說，打醮亦可說是一個『宇宙更新』（cosmic renewal）的過程，但是當地人包括法師在內都不認為儀式中有『宇宙』的成分。被迫要說的話，他們會承認『潔淨』是更新的一種形式。對當地的人來說，打醮是必須恆常進行，通常是每十年一次，因為這是祖先（對神明）的承諾，若未經神明准許便停止祭祀，不幸的事情恐怕會降臨身上。當地人不瞭解法師在做什麼，這對他們並不會產生困擾，這幾乎是打醮的一個特色。……因此，打醮混雜了多種傳統，並成了一種複雜的現象，只有熟悉鄉村和種種文化的人才能解說清楚。」

### 新界 傳統社會 濃郁的民俗氛圍

新界四十萬人口中，客家籍居民佔多數，他們世居此地，領有香港原居民的身分。原居民仍沿用清代律令處理宗族內事務，這些傳統族規現也具法律效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度想將之廢除，但是扳不動，可見原居民很「硬頸」的。一般香港人說法，新界原居民感情上傾向大中華主義，過去與殖民政府就不親，生活上也自成一個小世界。重傳統的原居民非常重男輕女，只有男嗣能分財產。在新界看到的「丁屋」就是原居民男丁滿十八歲分得土地蓋的房子。受容積率限制，丁屋只能有一百三十五平方公尺，多蓋成三層。女人看樣子不是找人嫁，就只能自力更生。

在這麼一個傳統社會，更可以感受民間信仰濃厚的氣息，從廟宇神壇到許願辟邪等屬靈場域散居各角落，包括車公廟、萬佛寺、蓬瀛仙館、青松觀、大埔林村許願樹、媽祖廟等，不時可見白領階級打扮的香港人虔敬的與神交流，與世人常見的花花物質世界的香港圖像頗有差異。

### 沙田車公廟 忠義化身香火鼎盛

車公廟是沙田香火最盛的一座廟宇，農曆年初二車公誕，大批香港民眾在初二和初三這兩天去車公廟上香，並轉動壇前的銅風車，祈求好運。到車公廟上香祈福的規矩甚是有趣，香客先焚香祈禱，廟裡執事再來幫忙持香連連拍叩香爐，嘴裡大聲念念有詞祝願一番，唯恐神明聽不到。

十三世紀南宋末代君主帝昺，相傳逃亡至香港，車公是帝昺的將軍，當時正逢大瘟疫，車公解救百姓疾苦而被奉為神祇。在信眾心中車公是忠義的化身，魂魄猶在人間。車公殿裡的車公塑像高大無比，雙眼炯炯，面容威武。

原來的車公廟小小的，已有三百多年歷史，近年在舊廟前另建新廟。新廟建築仿唐風格，顏色沈穆，與其他修飾豔麗的廟宇非常不同，方正寬闊的大門內圍著四合院落，主殿車公殿前有大型香案，兩旁站著追隨車公的參將副將的塑像，衣袂飄然，流散唐宋遺風。

### 大埔林村許願樹 求財求姻緣人氣旺旺來

想求財求姻緣，大埔的林村有兩株許願樹，據說可以幫得上忙。這兩棵樹在大埔天后宮附近，小的是洋紫荊樹，負責許賜愛情；大的是榕樹，負責賜橫財。由於靈驗之名已遠播，滿樹掛著紅符和黃橙，變成一處觀光景點了。

許願的程序很簡單，在附近香燭攤上買顆用一疊紅色紙符綁著的橙，寫上你的願望和姓名，然後朝樹上丟，掛得上去就表示所求照准，等著回去心想事成吧！擲

符能不能上樹，力氣要用得巧，低處枝桠未必好掛。有時候結果頗諧謔，寫招財進寶或一路大發的符都損龜，寫一無所求，竟然一丟即上，想發橫財難了。

